



边疆史地丛书

GU DA I TI GU  
LUNI WEN BEI  
MING  
BIAN JIANG SHI  
DI CONG SHU

# 古代突厥 鲁尼文碑铭

—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

[苏]C·Г·克利亚什托尔内 著  
李佩娟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古代突厥  
鲁尼文碑铭

##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

С.Г. КЛЯШТОРНЫЙ  
ДРЕВНЕТЮРКОКІЕ РУНИЧЕСКІ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ОРЕШНЕИ АЗ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4.

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  
——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  
〔苏〕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 著

李佩娟 译

责任编辑：张希玉

封面设计：陈冬妮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九站街1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5·插页2·字数290千  
1991年8月第1版·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

ISBN 7-5316-1172-4/K·32 定价：5.00元

(黑)新登字5号

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 译者前言

本著作者 C.Г. 克利亚什托尔内是苏联著名中亚史和突厥史学者。生于 1928 年。1950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长期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发表著作五十余种。现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蒙古突厥学研究室主任。本著于 1964 年发表，是苏联中亚史和突厥史领域近二十多年来的一部重要著作，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重视，评价甚高，其中也包括我国学者在内。

本著系统介绍了二百余年来各国学者发现、解读和研究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的情况，详细分析了碑铭所处的历史背景，深入研究了碑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进一步考证了碑文中出现的疑难词语。作者在研究碑文的基础上并以碑文提供的史料为主要依据，同时引用了其他文献，在分析研究各家之说后，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中亚史和我国西北地区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十分重视我国正史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作者主要通过俄文和西文的译本转引汉籍史料，个别地方略有出入，译者在译注中已有所更正。

全著引用的参考文献达七百四十余种，除俄、德、法、英、日、土、意文等文献外，引用了古罗马、希腊和阿拉伯、波斯以及格鲁吉亚、叙利亚的重要史料，由此也可见作者治学之严谨。为方便读者，译者将本著引用参考文献的书目全部译成汉文，因

涉及多种文字，虽经多方查核，仍恐有误译之处，希读者鉴谅。

译著参考了冯承钧译沙畹著《西突厥史料》、岑仲勉著《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罗致平译巴托尔德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等著作，还参考了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魏莘一编《古代突厥文献》（油印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考古资料》第二、三集（外文书刊论文要目）（油印本），等等。碑文译文系按俄文译出。核定译名过程中，凡汉籍史料中出现过的，一概不再音译，而取史界久已熟知的名称。然在史料中，有时同一名称在不同时代的著述中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著述中表达不一，据此，译名亦各异。尚有部分名称，有待进一步核实考证，或是音译未必得体，这类词只写原文，不予音译，这种处理方法在冯译《西突厥史料》和余太山著《吐哒史研究》中已有先例，译者认为，对于学术性著作是可以借鉴的。此外，汉籍史料记载的第二东突厥汗国的骨咄禄、默啜和默棘连可汗，在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分别称为颉跌利施、阿波干和毗伽，作者在不同情况下，时用史料名称，时用碑文名称，然以后者居多，译者依据原著不予统一。

多年前，罗致平、张广达和耿世民等教授曾对译者谈到本著的学术价值，希望能译成汉文。译稿之能完成，当感谢他们的启迪。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作者诚挚热情的帮助，部分译注是作者提供的材料。此外，耿世民教授通读了译稿，并对若干疑难问题提出了有益的意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限于水平，如有误译疏漏之处，敬希学界批评指正。

李佩娟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8年1月27日完稿

## 中文版序言

本著是早在 25 年前发表的。在此后的多次田野工作中，作者在西伯利亚和蒙古不断搜寻古代突厥文的新碑铭，发现了大量突厥语和粟特语的新文献。然而，作者在 60 年代初所提出的结论和假设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得到了新的印证。

我很高兴，我的科研成果得到了我的同行们中国学者的关注，对他们提出的见解我极为重视。我很感谢李佩娟，她圆满地完成了本著的翻译，为之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我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致以深切的谢意，希望我们由此开始的合作继续下去。

C·Г·克利亚什托尔内

1989 年 7 月

## 前 言

3 中亚细亚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和中央亚细亚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的古代史和中世纪早期史, 至今仍是世界史中研究得最薄弱的-一个部分。从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历史语言研究也可断言, 分布于亚洲大陆腹地的各民族, 在欧亚大陆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比原先所想的重要得多。

中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的历史研究之所以困难, 首先是由于历史文献的基础薄弱——史料相当少; 这些史料所反映的事件的范围又极窄; 大部分流传至今的史料不是来自中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 完稿的时间与所记事件的时间又不很接近。所以, 那些古碑铭文献的重要性是难以估量的, 虽然为数不多, 但对历史学家来说, 却具有两个重要而又无可辩驳的长处——原始性和准确性。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便属于这一类文献。

本著对古代突厥鲁尼文碑文中涉及中亚细亚的材料进行分析整理, 并与其他史料加以对比, 对修史学和史料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加以综述〔1〕。

古代突厥诸碑文主要引用马洛夫的版本〔2〕。

4 本著以上述版本中所发表的碑铭译文为基础。作者尽力逐字引用这些译文, 但对术语和修辞作了许多修改和核实, 只要对进一步研究无实质意义的, 就不再另加说明。

作者谨在此对读过本著手稿并不吝赐教的诸君表示深切的谢意。



## 【注 释】

〔1〕 克利亚什托尔内发表于1951~1962年的初步研究成果有如下论文：《康居民族地名考》，第54~63页；《药杀水——锡尔河》，第189~190页；《斗争史略》，第55~64页；《七河流域的粟特人》，第7~11页；《苏吉碑的历史——文化意义》，第162~169页；《费尔干纳所见青铜戒指上的古突厥鲁尼文铭文》，第167~168页；《论古代突厥碑文的真实性》，第173~175页；《粟特统治者的尊号》，第133~135页；《中亚细亚的粟特人》，第29~31页；《乌兰固木碑文》，第26~28页；《考释》，第245~251页；《论粟特侨居地》，第96~97页；《中国史料》，第155~156页。

〔2〕 马洛夫：《碑铭考》；《蒙古与吉尔吉斯碑铭考》。

# 目 录

<b>《边疆史地丛书》序</b> .....	( 1 )
<b>中文版序言</b> .....	( 5 )
<b>译者前言</b> .....	( 3 )
<b>前言</b> .....	( 6 )
<b>绪论</b> .....	( 1 )
<b>第一章 鲁尼文碑铭的时代</b> .....	( 16 )
关于突厥的早期记载(16)。第一汗国(17)。在中华帝国控制之下 (19)。单于都护府的起事 (21)。边陲的战争(27)。于都斤山林(28)。默啜时代 (30)。汗国的危机(32)。九姓乌护(36)。最后十年(37)。	
<b>第二章 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b> .....	( 47 )
鲁尼文(47)。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及其分类(53)。鄂尔浑碑铭的修史价值 (57)。鄂尔浑文献中的中亚 (73)。	
<b>第三章 粟特人与突厥</b> .....	( 86 )
粟特人.....	( 86 )
Altı ðub sordaq(88)。袭击灵州 (86)。契丹起事 (90)。六州问题 (91)。在中国的战争 (93)。进袭陇右 (95)。阙特勤的第一次远征 (96)。六州粟特人 (99)。粟特人在朔方的侨居地(100)。通西域路线记述(104)。风路 (105)。	

突厥	(107)
丝绸贸易 (107)。突厥传说 (108)。最后的匈奴 (110)。阿史那部 (111)。高昌的遗产 (113)。汗国的粟特人 (116)。朔方侨居地的兴起 (120)。	
阿尔瑚地区	(123)
突骑施的外族臣民 (123)。七河流域诸城市 (124)。粟特使臣 (126)。地域联盟 (133)。	
<b>第四章 东突厥汗国和中亚细亚</b>	<b>(154)</b>
西征	(154)
鸣沙战役 (154)。黠戛斯 (155)。突骑施 (157)。碑铭年代学述略 (158)。大食与吐火罗 (159)。康国的陷落 (167)。在通往粟特的途中 (170)。	
康居贪漫	(173)
东突厥汗国的西部疆界 (173)。石国首府。(175)。	
康居人	(179)
阙特勤的路线 (179)。康加尔人——斐奇内格人 Канґха (181)。康居 (190)。外高加索的康加尔人 (194)。康居传统 (196)。	
本书引用参考文献	(214)
碑铭的符号	(344)
缩写语	(345)

## 绪 论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在科学文献中最早出现了关于鲁尼字样的碑铭的报导。这些碑铭是西伯利亚的研究者在叶尼塞河 5 沿岸的岩崖上发现的〔1〕。在最早发现这些难以猜测的符号的人中，有一名被俘虏的瑞典军官 Ф.И. 斯特拉伦堡（塔伯特）。他于 1713—1722 年〔2〕住在西伯利亚，是他称这些符号为“鲁尼体”的。这个名称虽然并不准确，却在以后成了固定的科学术语。在近二百年期间内，各种解读碑文的尝试都归于失败。1889 年，西伯利亚方志学者、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雅德林采夫在北蒙古的鄂尔浑河上游发现三块石碑。其中一块只留下一些残片，上有汉文、鲁尼文以及后来考定的粟特文碑文（哈喇巴刺哈逊碑）；另外两块保存得较好，刻有鲁尼文和汉文碑文（和硕柴达木碑）〔3〕。1890~1891 年，芬兰和俄国的考古学考察队在发现碑 6 铭的地方拓制并拍摄了碑文，后刊布在专门的图册上〔4〕。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科学院和地理学会根据拉德洛夫的倡议，组织了一系列考察队去北蒙古，又在那里发现了新的鲁尼文碑铭，并对发掘物地带从考古学方面作了仔细的考察。

1891 年，雅德林采夫发现了翁金碑，1897 年，E.H. 克列緬茨在土拉河（Тoлa）河岸发现了一块新的大碑，以碑文作者的名字命名为噉欲谷碑。在蒙古之后，不久又在七河流域发现了若干鲁尼文碑铭〔5〕。

从和硕柴达木碑铭的汉文碑文看，可以确定：这些石碑的时间

可推定为公元八世纪，是为纪念突厥默棘连可汗(这是对其名字或尊号的汉文转写，在突厥文碑文中为毗伽可汗)和其弟阙特勤(突厥文碑文为阙特勤)而树立的；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鲁尼文碑文是以突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写成的〔6〕。1893年12月15日，在丹麦皇家科学院的会议上，汤姆森就解读鲁尼文的进展作了报告。1894年1月19日，拉德洛夫院士已完成了阙特勤碑突厥文碑文的第一个译文〔7〕。从这时起，古代突厥语言的研究，被列为突厥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当年的彼得堡便成了它的中心。

1892~1903年，彼得堡开始出版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著作，总结了鄂尔浑—叶尼塞文字的研究成果〔8〕。参加彼得堡古代突厥碑铭研究中心工作的有俄国东方学家拉德洛夫、麦廖兰斯基、维谢洛夫斯基、巴托尔德、罗曾、札列曼、瓦西里耶夫、科尔什等人；此外还有考释鄂尔浑碑铭汉文部分的中国学者〔9〕、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沙畹〔10〕和德国汉学家夏德〔11〕。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赫尔辛基是研究鲁尼文的另一个中心，那里的“芬兰—乌戈尔学会”出版了芬兰赴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的考古学考察队的材料〔12〕。“芬兰—乌戈尔学会”的出版物中还发表了汤姆森的突厥学著作，极为重要〔13〕。德国突厥学家班格和匈牙利突厥学家万伯里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对碑文作了大量的语言注释工作〔14〕。

1894~1896年，拉德洛夫、汤姆森和帕克尔发表了碑铭提供的历史资料与中国历朝编年史文献的对比研究的初步成果〔15〕。巴托尔德对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了总的评价：“在与中国学者以往所能提供的内容相比较下，碑铭对中国编年史的译者所确定的年代学基础究竟补证了多少内容，又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新的事实或对事实作出多少新的阐述，这是必须陈述清楚的。汤姆森就年代学基础问题得出结论说：在所叙述的各种事件中，除了阙特勤(可

能还有他的父亲)之死以外,没有一个事件可以有足够的把握和中国编年史上发生在一定日期的某一特定事件等同起来。大家知道,此后不久出版的马迦特著作,曾提出一系列这类的等同对比;那个时代的某些突厥民族的特殊计算法这一新的语言学事实的<sup>8</sup>确立,也是这种历史研究的成果。”<sup>[16]</sup>

巴托尔德<sup>[17]</sup>、马迦特<sup>[18]</sup>、麦廖兰斯基<sup>[19]</sup>、夏德<sup>[20]</sup>和沙畹<sup>[21]</sup>于1897~1903年发表的著作,为从修史学方面考释碑铭奠定了基础,开始了鲁尼文碑铭学研究方法上的探讨,并作出了这些碑铭是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细亚历史原始文献的评价。

现将这些年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列举如下:(1)确定了计算法与阙特勤和默棘连碑的年表(班格、马迦特),为考证碑铭的记载与汉文和部分阿拉伯文史料的记载是否相吻提供了可能性(马迦特、巴托尔德);噉欲谷碑和翁金碑的年代依然不清楚,而叶尼塞碑铭的日期,连约略估计都未做到,虽然从古字学的特点来看,还可说明西伯利亚鲁尼体字似是很古的文字;(2)根据碑铭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对汉文史料进行了精细的研究,从而更广泛地提供了碑铭记载的各个事件的历史背景和相互联系(夏德、沙畹);(3)从修史学角度研究碑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历史—政治、民族学、文化—历史和社会(最后一个方面,只有巴托尔德著作中谈到);(4)初步对比了碑文与阿拉伯、波斯、中国、东罗马和亚美尼亚史料,从而勾画了六一七世纪突厥诸汗国的历史概貌<sup>[22]</sup>。

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中期,对鲁尼文碑铭的研究兴趣有所淡薄。A.H. 萨莫伊洛维奇对新时期的特点描述如下:“麦廖兰斯基在研究突厥鲁尼体文字碑铭的三个主要成员中最年青,在研究方法的科学准确性方面,与汤姆森最接近,死亡从科学手上早早夺走了他的生命……。随着中国突厥斯坦沙漠出现大量的回鹘文献,

拉德洛夫放弃了对蒙古和西伯利亚碑铭的研究，他对这些碑铭（兰司铁和科特维奇较后期发现的碑铭不计在内）已作了初步的研究，并补充了难词注释和语法概述。班格写了几篇关于叶尼塞—鄂尔浑碑文的文章，揭示了这些碑铭的数词中个位数和十位数的特殊组合法。他没有停留在这些碑文上，而是对 Codex Cumanicus<sup>[23]</sup>进行详尽的研究，致力于诸突厥语言历史语法的初步研究。万伯里对突厥鲁尼文语言的研究只停留在并无重要意义的杂论上。兰司铁虽是一位突厥学家，然更以蒙古学见长。他只是短期参加了蒙古境内突厥碑铭研究者的行列，目的是使自己所发现的碑铭的原文和译文能公诸于世。”<sup>[24]</sup>

汤姆森在此后的古代突厥鲁尼文研究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从1893年至1927年，其学术兴趣一直是以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为中心。

多数研究者不再继续研究鄂尔浑—叶尼塞碑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东突厥斯坦<sup>[25]</sup>发现了大量的新资料，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已有了给人以强烈影响的发现；第二，对鄂尔浑—叶尼塞碑文的初步研究分析已结束。要取得作为论据的新的资料，要求进行长期的细致耐心的工作，然而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取得重大的进展。

在汤姆森发表了《突厥学》(Turcica) (1916年)和《蒙古的古代突厥碑铭考》(1922年)两部新著后，上述看法之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这两部著作是汤姆森对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从事三十多年研究才完成的。

与此同时，发现了新的碑铭，完成刊布和翻译的有汤姆森<sup>10</sup>（从东突厥斯坦发现的“鲁尼文文书”）<sup>[26]</sup>、兰司铁（苏吉碑和色楞格碑）<sup>[27]</sup>、科特维奇和萨莫伊洛维奇（阙利啜碑）<sup>[28]</sup>、马洛夫和纳默特（七河流域发现的碑铭和匈牙利的斐奇内格鲁尼文）<sup>[29]</sup>、

克谢诺方托夫、小东涅尔和雷塞南（从东西伯利亚发现的一些小碑）〔30〕。

这一时期，对碑铭从修史方面作了如下的研究：汤姆森崭新地解决了噶欲谷碑中提到的若干事件的年限问题；伯希和继续利用汉文文献的记载考释碑文〔31〕；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利用碑文解决某些历史—地理和民族学问题〔32〕；巴托尔德则广泛利用碑文材料从事文化—历史研究。

巴托尔德的贡献尤为卓著。他最后一部巨著就是驰名远近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6年夏于伊斯坦布尔大学讲学时所作。巴托尔德在《十二讲》中总结了自己多年来在操突厥语言诸民族的历史领域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33〕。在这些年代里，巴托尔德终于象对待历史文献那样去对待这些碑铭，在其评价中反映了中亚细亚修史学状况和古代突厥鲁尼文文献语文研究的深度：“碑铭除了其语言学意义外，对历史学家的意义也并不小，如八世纪突厥的自述，在许多方面充实了汉文史料的记载。然而，必须记住，从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发现解读碑文的钥匙起，虽已过去了三十多年，研究工作还远未结束，许多地方的解释仍有争论。如果离开语言知识，以现有的译文为基础把碑文当作历史文献来利用，这种尝试可能得出并已经常常得出截然错误的历史结论。”〔34〕

研究鄂尔浑—叶尼塞文字的新阶段，始于1930~1940年，它与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细亚突厥语言学和修史学中的重大变化是相联系的。由于将马合木·喀什噶尔的词典和其他一些材料用于古代回鹘文献的研究，古代突厥语言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充了。在建立诸突厥语言的历史分类法和历史语法学方面作了一些初步尝试，探索这些语言和另一些与其相近的语言在物质方面和类型方面的亲属关系的兴趣浓厚了〔35〕。在这种情况下，最早的突厥碑铭对进一步发展突厥语言学的作用明显增长了。与此同时，新发



现的材料，无论对于碑铭译文的重新审核，或是对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从语文学和历史学方面所做的注释的重新核实，都或多或少提供了可能。

奥尔昆在这方面作出的初次探索，不能认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然而，从总体研究鲁尼文碑铭的尝试性工作本身却是值得注意的<sup>[36]</sup>。继拉德洛夫几部名著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对古代突厥碑铭语言描述得相当详细的著述<sup>[37]</sup>。从事这一工作的有伯恩斯坦<sup>[38]</sup>、雷格迪隆<sup>[39]</sup>、阿兰钦<sup>[40]</sup>、谢尔巴克<sup>[41]</sup>、捷尼舍夫<sup>[42]</sup>、巴特马诺夫<sup>[43]</sup>、冯家昇<sup>[44]</sup>、克劳森<sup>[45]</sup>、阿尔托<sup>[46]</sup>、葛玛丽<sup>[47]</sup>、奥盖尔<sup>[48]</sup>、斯普伦格林<sup>[49]</sup>、布罗克曼<sup>[50]</sup>和吉罗<sup>[51]</sup>。他们发表了各种碑铭的译文和研究论述。戈齐耶夫致力于鲁尼文碑文的标点符号问题的研究<sup>[52]</sup>。马洛夫于1951~1959年发表的综述性著作，对研究古突厥文字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sup>[53]</sup>。

新碑铭的刊布工作和对早先已刊布的文献进行全面研究的工作一直在继续着。然而，只是到现在，才为从历史—语言学角度仔细研究古代突厥鲁尼文建立起相当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鲁尼文碑文的修史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苏联学者在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细亚历史的研究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他们在这些年代里所瞩目的中心问题是，从社会—经济方面描述古代突厥社会的特征<sup>[54]</sup>。从修史学角度考释鲁尼体字的其他方面则有所削弱<sup>[55]</sup>。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历史科学和资产阶级历史科学在对待碑铭上的原则分歧。资产阶级史学界人士倾向于把碑文仅仅看作是一种史料，即对于曾在中央亚细亚交替统治过的各个民族集团<sup>[56]</sup>或对于突厥所表现的、为“突厥尚武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所特有的“世界统治理想”<sup>[57]</sup>，是饶有兴味的史料。苏联研究者则已令人信服地指出：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的历史，首先是军事民主制度和原始奴隶制度转变为早期封